

【德】马克斯·韦伯 著
洪天富 译

儒教与道教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西方新教伦理导出资本主义精神和理性的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儒教与道教却为什么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深入、精辟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德】马克斯·韦伯 著

洪天富 译

本书责任编辑委 张继武

儒教与道教

(苏)新登字第001号

书 名 儒教与道教
著 者 [德] 马克斯·韦伯
责任编辑 周文彬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无锡春远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插页2
印 数 6031—10100册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1995年8月第1版第3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132—8/Z·75
定 价 10.8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01/30/20

出版说明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迫切需要理论上的借鉴与创造。为此,我社在优先出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关于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著作的同时,也适当选择一些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较有影响的著作出版。海外学者占有的丰富资料,他们的研究视角和某些方法,对我们认识中国的国情,评估中国文化的传统、心态及其前景,从而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的建设,都有着启迪和借鉴意义。当然,他们的著作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甚至同我们存

在着某些原则分歧,这是需要读者加以认真审察和辨识的。同时,任何借鉴都代替不了自己的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要靠我们自己去中国当代的实践中去概括和总结。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丛书只求为此提供某种有益的参照和比较。如果这套丛书能在这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将感到欣慰。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年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不仅要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100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将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

动的文明。也正因为这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古老的中国警句便仍然适用，我们可以借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从几代学人的成果中撷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见解时，我们自然不能从各家学说中只挑选那些我们乐于接受的东西。如果那样做，这“筛子”本身就使读者失去了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但这次译介毕竟只是初步的尝试，成败利钝，欢迎论评。

丛书编委会 1988年

译者序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系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在西方,他的名字常和卡尔·马克思以及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克海姆(E. Durkheim, 1858—1916)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被奉为当代社会学的三位神明。他所创立的“理解的社会学”(verstehende Soziologie),以其独特的方法论和思想内涵而独树一帜,至今仍散发着光芒,对今天的读者还有深刻的启示作用。韦伯的学说,是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德国特定的社会现实进行深入思考的产物。因此,在论述他的理论之前,有必要简要地描述一下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特点。

韦伯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1789—1871;1871—1914;1914—。第一个时期是资产阶级上升和全盛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资产阶级绝对统治和衰落的时期,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变成反动的和最反动的财政资本的时期。这是新的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聚集力量的时期。第三个时期,即帝国主义时期,帝国主义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的动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资产阶级处于第一个时期的封

建主所处的“地位”^①。

在韦伯的祖国,1871年俾斯麦依靠“铁与血”的手段统一德国后,建立了一个以容克贵族为主的贵族-资产阶级国家——德意志帝国。这个帝国在19世纪后半叶以高速的发展而跻身于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凭借欧美的先进技术和法国战败赔款所提供的资金来源,在合理化原则的指导下,德国的大银行、大企业等各种垄断性的联合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剧增。随着工业的集中,大城市蓬勃兴起,其中柏林居于首位,上世纪末,它已拥有400万居民。到1900年,只有大约20%的德国人住在农村。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到1914年,工会组织所拥有的人数已达300万之多。劳资间的阶级斗争此起彼伏,日益尖锐化。德意志帝国为了争夺殖民地、转移国内阶级斗争的视线,正策划发动一场掠夺性的战争。德国人民普遍具有一种山雨欲来的不安宁感。1914—1918年,终于爆发了世界大战。

面对这种复杂、动荡不安的形势,德国的思想家们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思考和寻求出路。哲学家尼采断言,在这个时代里,“上帝已经死了”,需要“重新估价一切价值”,需要呼唤“超人”。尼采从右的方面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在他看来,这个世界被基督教的虚假断言——即认为存在着与我们直接体验到的现实不同但却更美好的一种秩序——所欺骗。尼采认为,德意志帝国之所以变得野蛮和愚蠢,是由于权力以及民众的崛起所造成的;社会的粗陋势必导致技能、批判的判断、创造的喜悦以及贵族的价值观的一场毁灭。尼采因此预言,20世纪将出现恐怖和庸众专制的局面。

韦伯同时代的人、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通过其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展示了19世纪末叶德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揭示了德国资产阶级从进

①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1卷,第124—125页。

步的阶级(市民阶级)变成腐朽没落的阶级(垄断资产阶级)的发展过程。但是,由于作者在思想上受到叔本华悲观主义和尼采虚无主义的影响,看不到任何出路。

以梅林、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志,决心把受尽资本压迫和剥削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联合其他的劳动群众,进行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使工人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获得解放。1918年11月,以李卜克内西为首的“斯巴达克同盟”领导柏林的工人和士兵举行了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然而,“十一月革命”的成果被以艾伯特为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篡夺了。1919年2月,资产阶级通过了魏玛宪法,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韦伯一生经历了德国从威廉帝国至魏玛共和国初期的种种历史事件。1885年冬季,他就读于哥廷根大学,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卷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94年,他在弗莱堡大学任教期间,阅读了《资本论》第三卷。1903年,阅读了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1905年,学习俄语,并开始研究俄国第一次革命。1906年,出席社会民主党大会,对其小资产阶级性感到失望。1909年,担任《社会经济学讲座》的编务,开始细心观察官僚制度问题。1914年,以爱国者身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任职于医院。1917年,潜心研究俄国革命与德国内政改革问题。1918年,对奥地利上校团发表“社会主义”演说。1919年,参与起草魏玛宪法。

韦伯声称,他的知识背景是由马克思和尼采支配的,并且说过,“谁要是不承认如果没有这两个人,他就不可能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做出重要贡献,那么他就是在自欺欺人。”^①诚然,韦伯受到过马克思和尼采的影响,但他的学说,就其实质说,是与他们的思

^① 《韦伯》,D·麦克雷著,孙乃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77页。

想体系大相径庭的。尼采否定以往的一切价值；而韦伯则认为各种价值不是来自一个单一的、明确的等级制度，价值是多元的，需要区分“非理性的价值”和“理性的价值”。尼采强调超人的“权力意志”；而韦伯则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劝告，因为超人——低能者的责任乃是使自己的意志服从超人的意志——将随心所欲地选择、决定和行动，拿生命做赌注。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问题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韦伯则认为，他的任务在于理解和解释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有能力团结其他的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韦伯则认为，工人在政治上尚未成熟，尚不具备足够的力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即使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它也会成为帝国政权的囚徒，等等。韦伯与马克思的分歧，集中地表现在他所创立的关于“理解”(Verstehen)和“理想型”(Ideal-typ)的方法论上。



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在考察个人的社会行动时，必须联系个人所在的阶级或集团的社会行动。韦伯则认为，集团并不能思想、感受、理解，只有人才能如此，因此，社会学的任务在于深入到个体的主观理智之中，通过一种对行动者的移情联系，去理解社会行动。“为了社会学的目的，并不存在‘行动’的集体个性这样一种东西。当在社会学系统里涉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家公司……或者其他类似的集团时，它所意味的只是……单个个人的现实的或可能的社会行动的某种发展。”^①

韦伯把对人的行动的理解分为两种：“现场的观察性理解”和

① 《经济与社会》，纽约 Bedmister 出版社 1968 年版，第 13 页。

“解释性理解”。前者告诉我们什么正在进行之中，后者告诉我们为什么它会进行。例如，当我们观察到樵夫砍柴的时候，我们只理解他正在砍柴，但不知他为何要这样做，只有当我们了解到他行动的原因，比如为了赚钱，为了养家糊口等等，我们便达到了解释性的理解。韦伯借此想说明，只有参照一种更广阔的知识构架，一种社会行动才能被适当地理解和解释。但韦伯并不认为理解是社会解释的全部，理解只是针对行为之假设的丰富的源头，它必须由其他的调查技术来补充。换言之，理解只是一种假设，它必须被置于经验的调查和验证之下。

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过来也可作用于存在，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精神的时候，必须从分析资本主义精神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入手。韦伯则认为，物质和精神是可以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前者决定后者的问题，相反地，在现代资本主义问题上，倒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论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时将详细加以讨论）。韦伯根据资本主义的规范性和制度性是否得到结合，把社会分为四种类型：部落社会，在这类社会里，资本主义的规范性和制度性均未出现；东方社会，在这类社会里，资本主义的制度性虽已出现，但却没有理性的经济精神；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在这类社会里，资本主义的精神活跃而兴旺，但却缺乏适当的制度性支持。例如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美国政治家、作家和物理学家）这位资本主义精神的最高化身却在宾夕法尼亚的边远地区勉强度命；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这类社会里，资本主义的规范性与制度性得到了高度结合。

韦伯认为，社会现实不能凭借让事实“本身来发言”而被理解。社会事实并非像海滩上的卵石那样等待着人们去拣拾。什么东西算作社会事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我们通过它去打量世界的精

神眼镜。因此,要正确地理解社会现实或社会行动,必须在理论上假定它们的“纯粹”形态,以此与它们的现实过程进行比较。这种“纯粹的”形态便是“理想型”。理想型不是现实型(Realtyp,现实中的确存在的典型,例如“他是一个典型的股东”,“那是一个典型的合同”等等),而是一种逻辑建构(logische Konstruktion),它从来没有在历史、社会的真实里存在过;它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用以检视经验界的事实,掌握社会领域的复杂性。换言之,按照韦伯的看法,只有通过这种清晰的理想型之建构来分析社会现实或社会行动,社会学家才有可能从经常是互相抵触的、混乱的经验材料中理出个头绪来,从而精确地显示事实的最关键性的层面。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经验材料加以取舍,选择和强调那些对所讨论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材料,扬弃和贬低那些与所讨论的问题无关紧要的事实材料。例如,韦伯本人在研究宗教社会学的时候,首先从分析中古以来西欧历史的演变入手,从中选择出一些他认为是促成西欧近代资本主义之发达的主要因素,再将之有系统地组合起来,这就产生了一个西欧资本主义之形成的“理想型”,然后,他利用西欧资本主义的这个“理想型”进一步检视其他异文明的相关因素,将之有机地构成那个异文化社会的“理想型”,再将这个异文化社会的“理想型”与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型”进行比较,以期为近代资本主义为何只在西欧产生出来这个问题提供较满意的解释。

二

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共三卷。第一卷包括《序言》(192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基督新教诸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1906),《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其中又

包括：《导论》(1915)，《儒教与道教》(1915)，《中间考察——宗教拒世的阶段与方向》(1915)。第二卷包括《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续)：《印度教与佛教》(1916—1917)。第三卷包括《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续)：《古犹太教》(1917—1919)。整个论文集的目的，在于通过东西方诸大宗教的对比研究，来突显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色。这里，我们限于篇限，不可能一一地论述诸大宗教之间的差异，只能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儒教与道教》(即《中国的宗教》)的思想内涵作一简要的介绍。在这两部宗教社会学著作里，韦伯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中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①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集中地探讨了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如何兴起的论题。韦伯在这里力图论证：理念与理想并非总是物质环境的反映，它可以成为引发社会经济变迁的真正独立又自发的动力。具体地说，西方民族在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不仅和资本主义精神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合力，而且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一个活跃的、决定的力量。韦伯以新教中的加尔文派的教义为范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加尔文派信奉上帝预选说，认为人的生死是由上帝永恒的天命所决定的，“按照上帝的旨意，为了体现上帝的荣耀，一部分人与天使被预先赐予永恒的生命，另一部分则预先注定了永恒的死亡。”^②因此，加尔文教徒为了避免遭到上帝的惩罚，争取获救，便开始无休止地进行劳作和有条有理地进行俗世活动。这种建立在“天职”基础上的

① 参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第15页。

② 同上书，第75页。

合理的经济行为,导致了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此外,加尔文教徒的天职概念,还造就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劳动精神”。韦伯指出,传统型的工人,他们的劳作只限于为挣到“习惯工资”所必需的长度。而信奉加尔文教的工人,由于苦于渴望被救,把劳动视为一种天职,为了雇主的利益倾出自己的全力,来确立受到神宠的证据。或许,资本家从他的劳动中榨取的剩余价值越多,他在适当的程度上完成其天职的标记就越清晰。总之,代替着一个行动迟缓的和无精打彩的劳动阶级,新教伦理为雇主提供了清醒、谨慎而且特别勤勉的工人,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提供了一支充满这种精神力量的劳动大军。加尔文教的禁欲主义的教条不允许它的教徒们消耗财富,但又不容许他们让财富呆滞不用,结果,他们排斥肉体享受,把已经获得的财富用于投资,“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①

综上所述,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生和发展。具体表现为:1. 追求财富与金钱的活动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也不是一种罪恶,相应地,无止境地追求利润的活动逐渐被认可。2. 勤奋地努力工作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和一种道德义务。3. 强调纪律与控制,“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信奉无纪律的自由自在的信条的人的劳动。”^② 4. 理性的劳动组织方式,“精确的核算与筹划(这是其他一切事情的基础)只是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③

一言以蔽之,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使物质(资本主义的制度

①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35页。

② 同上书,第40,12页。

③ 同上书,第40,12页。

性)与精神(资本主义的规范性)达到了高度的结合,从而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

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里,韦伯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提供的资本主义的“理想型”为参照系,试图论证这样一个主题: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缺少的鼓舞力量。

译者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发现,韦伯只提及大禹治水的故事,但避而不谈尧舜圣君或桀纣暴君等等“有为”或“昏庸”的君主;只谈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史实,而不谈秦汉、隋唐等等朝代的兴替;只谈从采邑制度到家产官僚制度的转变,而不谈从奴隶制、封建制到资本主义萌芽期的转变;只谈王安石的变法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而不谈奴隶主、封建领主与农奴之间激烈而悲壮的阶级斗争;他写此书是在1915年,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却在他的视野之外。他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也与我国学者的大相径庭,例如,他把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的社会称作“封建社会”,而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直至清代所建立的社会称作家产官僚制社会。在韦伯所描绘的中国历史图像里,一些我们所熟悉的人物、制度、事件退居幕后,取代他们居于主要地位的是一些超出我们常识范围的现象与观念。韦伯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这种独特的构想,是和他写此书的目的和方法密不可分的。

韦伯写此书的目的是,既不是为了描述中国的经济史,也不是为了反映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史,而是试图通过对传统的中国社会以及儒教与道教的分析,论证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的论点: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东方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伊斯兰国家)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宗教伦理精神对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因此,他采用的方法是

比较的方法和重点被彻底颠倒过来的“理想型”的方法。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根据他所提出的“理想型”，强调了那些可以说是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着广泛一致性的教义，而忽略了那些显得与资本主义精神不和谐的因素。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韦伯却采用了相反的程序，强调了那些阻碍理性的经济活动的精神因素，而贬低那些似乎是十分符合经济理性的因素。在西方，精神的因素（新教伦理）促进了物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情况恰恰相反，精神的因素（儒教与道教）阻碍了物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韦伯关于中国的宗教伦理有碍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明显地反映在本书的结构之中。本书由三篇构成：第一篇为物质部分；第二三篇为精神部分。在第一篇《社会学的基础》（从第一章至第四章）里，韦伯重点考察了与他的主题密切相关的五个中国社会的物质层面：货币制度、城市与行会、家产制国家、氏族（血缘）组织以及法律。

韦伯从分析货币制度与城市入手，这是因为这两个因素与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货币能扩展经济交换的领域，有助于财富的追求与积累，并可作为经济价值的衡量标准，以评量不同性质的物质与劳务的相关经济意义。货币制度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标志之一。但是在中国，货币虽有所发展，但未形成一套有效率的货币制度，因此缺乏资本发展的征兆，而且也阻碍了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和西方的城市，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发展的。在中国，城市几乎总是处于中央集权和军方的统治之下，缺乏中世纪后期欧洲城市所享有的军事、法律和政治的自主权。因此，尽管中国城市里的工商业行会在组织上拥有自主性，并且在社会经济生活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它们的特殊的权益未能受到法律的保障，因此不可能发展成为在经济和政治上独立的自由化阶层——市民阶层（*Bürgertum*，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而